

# 「退避三舍」考—— 兼說古代中國北方與內亞間的文化聯繫\*

陳健文\*\*

## 摘要

「退避三舍」是源自於春秋時代晉文公的一個著名典故，此典故其實蘊含了中國古代一種特殊的軍事文化，即在戰場上需對敵人展現某種程度的寬容，而此種習俗也反映了先秦貴族階級強調「君子之爭」的優雅情操。但這個看似純粹中國式的歷史典故，卻在中亞有著極為相似的軍事文化。中亞古代的游牧民族瑪撒該塔伊人（Massgetae）在與波斯人作戰的過程中，也曾對居魯士二世（Cyrus II）提出類似的要求，此點相當令人玩味。從這種古老的軍事文化分別在中國北方與中亞流行一事來看，「退避三舍」這類軍事習俗可能是一種流傳於古代內陸歐亞東部的古老文化，透露出早自先秦時期開始，中國北方與內陸歐亞之間即存在著密切的族群與文化互動，而中國北方地區很可能也是所謂「內亞性」（Inner-Asia-ness）起源的一個重要區域。

關鍵詞：退避三舍、行軍速度、瑪撒該塔伊人、戎狄、農牧交錯帶、內亞性

---

\* 本文寫作過程曾獲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經費補助（計畫編號：102-2410-H-003-004），另蒙審查人給予諸多改進意見，謹申謝忱。

\*\*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

## 一、前言

「退避三舍」是源自於春秋時代晉文公（重耳，671B.C.-628B.C.，636B.C.-628B.C.在位）的一個著名典故，此典故其實蘊含了中國古代一種特殊的軍事文化，即在戰場上需對敵人展現某種程度的寬容，而此種習俗在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先秦貴族階級強調「君子之爭」的優雅情操。但此一幾乎是眾人耳熟能詳的故事背後所隱藏的歷史意義，卻絕非僅是一個中國先秦時代的歷史典故而已。學界常忽略在遙遠的中亞地區，<sup>1</sup>竟存在著與古代中國「退避三舍」極為相似的軍事文化。中亞古代的游牧民族瑪撒該塔伊人（Massagetaes）在與波斯人作戰的過程中，也曾對居魯士二世（Cyrus II of Persia, 600B.C.-530B.C.）提出類似的要求，此點相當令人玩味。究竟這兩者之間有無關聯性？從這種古老的軍事文化分別在中國北方與中亞流行一事來看，「退避三舍」這類軍事習俗極可能是一種流傳於古代內陸歐亞（以下簡稱「內亞」）東部的古老文化，<sup>2</sup>這也不禁令人反省古代中國北方地區與內陸歐亞之間，<sup>3</sup>自先秦時期開始極可能就存在一些共有的文化成分，中國北方與內陸

<sup>1</sup> 本文所謂的中亞，強調的是地理區域概念，係指臺灣學界以往所俗稱的「俄屬中亞」，即本文中瑪撒該塔伊人的居地。依據希羅多德《歷史》（I：201、204）的記載，他們是住在卡斯披亞海（即裏海）東面的平原，阿拉克賽斯河（按：即錫爾河）對岸和伊賽多涅斯人相對的地方，參見 Herodotus, *Histories*, trans. George Rawlinson (New York: Wordsworth Editions Limited, 1996), pp. 90-91；中譯本參見希羅多德 (Herodotus) 著，王以鑄譯，《歷史》（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7），頁99-100。Minns 認為瑪撒該塔伊人可能居住於錫爾河與阿姆河之間，參見 Ellis H. Minns, *Scythians and Greeks* (New York: Biblo and Tannen, 1971), p. 30；另參見 Ioannis Xydopoulos, “Defining identities in the Black Sea region: The case of the Massagetae in Greek literary sources,” *ETNATIA*, 14 (2010), p. 20.

<sup>2</sup> 本文所謂之「內陸歐亞」，其內涵指涉主要以歐亞草原地帶為中心，東至黑龍江、松花江流域的森林地帶，西抵歐洲多瑙河流域，南則與世界主要定居文明區域相毗鄰，以下簡稱為「內亞」，參見祁美琴、陳駿，〈中國學者研究中的「內亞」概念及其問題反思〉，《中國人民大學學報》，2019：3（北京，2019.5），頁164。

<sup>3</sup> 本文所指的中國北方地區，約略等同俗稱的華北地區，即現今甘肅與青海東部、山西、陝西、河南、河北、山東等地。

歐亞之間密切的族群與文化互動，應重新被學界審視。其實考古學已在早期中國北方與內陸歐亞的文物關係上做出很多重要成果，尤其近年來，透過新出土考古文物來探索早期中國與內亞關係的議題取向，已成為一種新的研究熱潮。<sup>4</sup>在學界近來熱烈討論的中國文明「內亞性（Inner-Asia-ness）」問題中，<sup>5</sup>其實我們不應忽視中國北方地區很可能也是所謂「內亞性」起源的一個重要區域。本文欲從考證「退避三舍」的問題入手，希望藉由釐清「退避三舍」的實際內涵，能作為學界探討中國古代文明「內亞性」問題時的一個參考。

<sup>4</sup> 重要的學術專著成果如李海榮，《北方地區出土夏商周時期青銅器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楊建華，《春秋戰國時期中國北方文化帶的形成》（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烏恩，《北方草原考古文化研究》（北京：科學出版社，2007）；烏恩，《北方草原考古文化比較研究》（北京：科學出版社，2008）；楊建華、蔣剛主編，《公元前2千紀的晉陝高原與燕山南北》（北京：科學出版社，2008）；史黨社，〈秦關北望——秦與「戎狄」文化的關係研究〉（上海：復旦大學歷史系博士論文，2008）；韓建業，《中國西北地區先秦時期的自然環境與文化發展》（北京：文物出版社，2008）；李水城，《東風西漸——中國西北史前文化之進程》（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Gideon Shelach, *Prehistoric Societies on the Northern Frontiers of China* (London; Oakville, CT: Equinox Pub., 2009); 呂學明，《中國北方地區出土的先秦時期銅刀研究》（北京：科學出版社，2010）；李剛，《中國北方青銅器的歐亞草原因素》（北京：文物出版社，2011）；楊建華，《北方先秦考古研究》（北京：科學出版社，2015）；韓金秋，《夏商西周中原的北方系青銅器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潘玲，《中國北方晚期鑄研究》（北京：科學出版社，2015）；楊建華等，《歐亞草原東部的金屬之路：絲綢之路與匈奴聯盟的孕育過程》（北京：文物出版社，2016）；陳洪，《秦文化之考古學研究》（北京：科學出版社，2016）。

<sup>5</sup> 羅新，〈內亞視角的北朝史〉，收入彭衛主編，《歷史學評論》，第1卷（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頁108-115；羅新，〈內亞傳統的連續性與中國歷史的內亞性〉，收入羅新，《黑氈上的北魏皇帝》（北京：海豚出版社，2015），頁66-74；鍾焓，〈簡析明帝國的內亞性：以與清朝的類比為中心〉，《中國史研究動態》，2016：5（北京，2016.10），頁36-42；劉文鵬，〈內陸亞洲視野下的「新清史」研究〉，《歷史研究》，2016：4（北京，2016.8），頁144-159；王一凡，〈北宋時期內亞因素對中原漢文化之影響〉，《中原文物》，2017：1（鄭州，2017.2），頁35-42。

## 二、「退避三舍」本事

晉文公在位時對楚成王（惲，?-626B.C.，671B.C.-626B.C.在位）的「退避三舍」，是中國極為著名的歷史典故。西元前 637 年，因驪姬之亂而被迫出亡在外的晉國公子重耳，在受盡各國人情冷暖之後來到了楚國，意外受到楚成王以高規格的諸侯之禮相待。《左傳·僖公二十三年》記載楚成王曾詢問重耳若能順利回國時，將何以為報？重耳回答：

若以君之靈，得反晉國，晉楚治兵，遇於中原，其辟君三舍。<sup>6</sup>

此事另見《史記·晉世家》：

重耳曰：「即不得已，與君王以兵車會平原廣澤，請辟王三舍。」<sup>7</sup>

然《左傳·僖公二十八年》卻載言「退避三舍」者實為重耳之謀士子犯（715B.C.-629B.C.）：

子玉怒，從晉師。晉師退。軍吏曰：「以君辟臣，辱也；且楚師老矣，何故退？」子犯曰：「師直為壯，曲為老，豈在久乎？微楚之惠不及此，退三舍辟之，所以報也。背惠食言，以亢其讎，我曲楚直，其眾素飽，不可謂老。我退而楚還，我將何求？若其不還，君退、臣犯，曲在彼矣。」退三舍。楚眾欲止，子玉不可。<sup>8</sup>

有關重耳的「退避三舍」，有學者認為「退避三舍」能讓自己先站

<sup>6</sup> 楊伯峻，《春秋左傳注》（北京：中華書局，1995），頁409。又《國語·晉語四》所載大致相同，參見徐元誥撰，王樹民、沈長雲點校，《國語集解》（北京：中華書局，2002），頁332。

<sup>7</sup> 漢·司馬遷，《史記》（點校本，北京：中華書局，1959），卷39，〈晉世家〉，頁1659。

<sup>8</sup> 楊伯峻，《春秋左傳注》，頁458。

上一個道德的制高點，另一方面也有充分時間去爭取一個更好的地理戰略位置，<sup>9</sup>或是基於策略應變，讓晉方從「我曲彼直」轉為「君退臣犯」而使曲在彼，<sup>10</sup>實際上是爭取輿論，也避楚軍鋒銳並懈其士氣，<sup>11</sup>以便最後集中兵力，激發晉軍將士力戰破敵的情緒，來尋求一個「後發制人」的可勝之機。<sup>12</sup>

不過重耳的「退避三舍」之舉，日後演變為戰場上貴族展現仁者氣度的一種行為，甚至成為禮制，而成為兵家所推崇的一種君子風範。《司馬法·仁本第一》云：「古者：逐奔不過百步，縱綏不過三舍，是以明其禮也。」<sup>13</sup>在先秦時代的戰爭中，在戰陣中追擊敵人不逾百步，以戰車追敵不超過三舍距離，充分展現了貴族崇尚「君子之爭」的仁者風度。西周、春秋之際此種強調不趁人之危的貴族遺風，我們尚可在泓水之戰後，宋襄公（茲甫，?-637B.C.，650B.C.-637B.C.在位）強調其「不重傷，不禽二毛」、「不鼓不成列」的談話中窺知一二。<sup>14</sup>另一個明顯的例子則是華豹（?-521B.C.）與公子城之戰，在二人的對戰中，華豹本在第一箭失誤後欲連發第二箭，但經公子城抗議「不狎，鄙！」之後（即未依貴族決戰慣習讓對手回擊），<sup>15</sup>華豹以君子之風抽下已經持滿將發的箭，結果竟反遭公子城回擊的箭支射殺。對於華豹的舉措，基爾曼（Kierman）認為這是一種堅持道德優先的騎士精神。<sup>16</sup>

類似的君子風範在古代希臘也可見到，波里比阿斯（Polybius,

<sup>9</sup> Frank A. Kierman Jr., "Phases and Modes of Combat in Early China," in *Chinese Ways in Warfare*, ed. Frank A. Kierman Jr., and John K. Fairbank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4), pp. 50-51.

<sup>10</sup> 張高評，〈《左傳》敘戰徵存兵法謀略〉，《古典文學知識》，2018：3（南京，2018.5），頁131-132。

<sup>11</sup> 高銳，《中國上古軍事史》（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1995），頁187。

<sup>12</sup> 黃樸民，《中國軍事通史·第二卷 春秋軍事史》（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1998），頁210；李東海，〈「退避三舍」之分析〉，《語文教學通訊·D刊（學術刊）》，2012：Z1（太原，2012.8），頁186。

<sup>13</sup> 劉仲平註譯，《司馬法今註今譯》（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7），頁9。

<sup>14</sup> 此事見於《左傳·僖公二十二年》，參見楊伯峻，《春秋左傳注》，頁397-399。

<sup>15</sup> 此事見於《左傳·昭公二十一年》，參見楊伯峻，《春秋左傳注》，頁1429。

<sup>16</sup> Frank A. Kierman Jr., "Phases and Modes of Combat in Early China," p. 43.

208B.C.-125B.C.) 曾緬懷過去的希臘人：

不會選擇欺騙手段去打敗他們的敵人，反而認為，若非是把敵人引至公開地點然後殺掉他，就沒有任何榮耀可言，即便戰勝也於心不安。因此，雙方有約：互相之間不用暗器或投彈武器，他們確信：只有面對面的短兵相接才是戰爭勝負的唯一裁決方式。為了這些原因，他們得提前向對方宣告開戰，通知自己進攻的時間，甚至告訴敵人自己的陳兵地點。<sup>17</sup>

這充分顯示在古代東西方的戰爭中，堅守貴族價值仍是相當重要的指導原則。

### 三、所謂「三舍」之意涵

然上文中所謂的「三舍」，其實際意涵究係為何？所謂的「舍」，其意即安營扎寨，讓軍隊住下來。<sup>18</sup>前引《史記·晉世家》於「請辟王三舍」句下《集解》有云：

賈逵曰：「《司馬法》『從遯不過三舍』。三舍，九十里也。」<sup>19</sup>

楊伯峻認為，「古者師行一宿為一舍，莊三年《傳》『凡師一宿為舍』是也；而師行每日三十里，故三十里亦為一舍。《晉語四》韋注引《司馬法》云：『進退不過三舍，禮也。』」<sup>20</sup>時至西漢，30里仍為軍隊一般日行之常規距離，《漢書·王貢兩龔鮑傳》云：「臣聞古者師日行三十里，吉行五十里。」<sup>21</sup>又《漢書·賈捐之

<sup>17</sup> Victor Davis Hanson, "Genesis of the Infantry," in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Warfare*, ed. Geoffrey Parker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p. 22. 中譯本參見傑弗里·帕克 (Geoffrey Parker) 著，傅景川等譯，《劍橋戰爭史》（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頁29-30。

<sup>18</sup> 李零，《兵以詐立——我讀《孫子》》（北京：中華書局，2006），頁236。

<sup>19</sup> 漢·司馬遷，《史記》，卷39，〈晉世家〉，頁1659。

<sup>20</sup> 楊伯峻，《春秋左傳注》，頁409。

<sup>21</sup> 漢·班固，《漢書》（點校本，北京：中華書局，1962），卷72，〈王貢兩龔鮑

傳》：

至孝文皇帝，閔中國未安，偃武行文，則斷獄數百，民賦四十，丁男三年而一事。時有獻千里馬者，詔曰：「鸞旗在前，屬車在後，吉行日五十里，師行（二）〔三〕十里，朕乘千里之馬，獨先安之？」於是還馬，與道里費。<sup>22</sup>

此事另見荀悅（148-209）《漢紀·孝元皇帝紀上》：「詔曰：『鸞旗在前，屬車在後，師行三十里為程，騎行五十里為程。』」<sup>23</sup>依此二史料之記載，30里為正常速度，情況許可時可至50里。若以漢代一華里相當約400或415公尺計算，<sup>24</sup>西漢時代一天的行軍距離約當現今12公里至21公里（30里至50里）之間。<sup>25</sup>

下迄東漢，仍有一日行軍距離為30里的記載，《後漢書·南蠻西南夷列傳》載：「大將軍從事中郎李固駁曰：『軍行三十里為程，而去日南九千餘里，三百日乃到。』」<sup>26</sup>又同書〈虞傅蓋臧列傳〉亦云：「兵法日行不過三十里，以戒不虞。」<sup>27</sup>古代行軍若日行超過30里，將對軍隊造成極大的負擔，《史記·孫子吳起列傳》曾引孫武（545B.C.-470B.C.）云：「兵法，百里而趣利者蹶上將，五十里而趣利者軍半至。」<sup>28</sup>從戰爭的實際面而言，作戰行軍若一味的急求速度而日夜行軍，成效很可能會適得其反。《孫子·軍爭

傳》，頁3058。

<sup>22</sup> 漢·班固，《漢書》，卷64，〈賈捐之傳〉，頁2832。

<sup>23</sup> 漢·荀悅，《漢紀》，收入張烈點校，《兩漢紀》（北京：中華書局，2002），上冊，頁375。

<sup>24</sup> 桑原鷺藏認為漢里1里約當400米，參見桑原鷺藏著，仇在盧譯，〈漢里之實長〉，《禹貢》，4:2（北平，1935.9），頁12。《劍橋中國秦漢史》認為漢里1里約415米，參見Denis Twitchett and Michael Loewe ed.,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ume 1, The Ch'in and Han Empires, 221 B.C.-A.D. 220*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p. xxxviii.

<sup>25</sup> 李零認為1舍約合今12.47公里。參見李零著，《兵以詐立——我讀《孫子》》，頁236。

<sup>26</sup> 劉宋·范曄，《後漢書》（點校本，北京：中華書局，1965），卷86，〈南蠻西南夷列傳〉，頁2838。

<sup>27</sup> 劉宋·范曄，《後漢書》，卷58，〈虞傅蓋臧列傳〉，頁1868。

<sup>28</sup> 漢·司馬遷，《史記》，卷65，〈孫子吳起列傳〉，頁2164。

篇》即明言：

舉軍而爭利，則不及；委軍而爭利，則輜重捐。是故卷甲而趨，日夜不處，倍道兼行，百里而爭利，則擒三將軍，勁者先，疲者後，其法十一而至。五十里而爭利，則麌上將軍，其法半至。三十里而爭利，則三分之二至。是故軍無輜重則亡，無糧食則亡，無委積則亡。<sup>29</sup>

足見即使是以標準日行 30 里的速度行軍，士卒能跟上者仍然僅有三分之二。十九世紀軍事名家克勞塞維茨（Carl von Clausewitz, 1781-1831）也有相同的觀察，他指出：

一次適度的行軍並不會使軍隊這個工具受什麼損害，但是連續幾次這樣的行軍就會使軍隊受到損害，如果是連續幾次困難的行軍，那麼軍隊受到的損害自然會更大。在戰區內，缺乏給養和宿營條件，道路很壞或破壞嚴重，軍隊要經常保持戰鬥準備，這些都會造成軍隊力量的過分的消耗，使人員、牲畜、車輛和被服受到損失。……1812 年 6 月 24 日拿破崙渡過涅曼河時，他準備進攻莫斯科用的巨大的中央兵團有三十萬一千人。……而在五十二天內連續行軍大約七十普里（572.27 公里）的過程中，僅病號和掉隊的就損失九萬五千人，約占總兵力的三分之一。……因此，人們想要在戰爭中進行頻繁的行軍，那就必須做好兵力將遭受大量損失的準備。<sup>30</sup>

李零認為作戰奔襲當然需要高速強行軍，但是軍事裝備對士兵的負擔與此卻是矛盾的，即速度與輜重的矛盾，<sup>31</sup>故中國古代軍隊行

<sup>29</sup> 春秋·孫武撰，三國·曹操等注，楊丙安校理，《十一家注孫子校理》（北京：中華書局，1999），頁137-140。

<sup>30</sup> 1 普里（普魯士里）等於 7532.48 米。參見克勞塞維茨（Carl von Clausewitz）著，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院譯，《戰爭論》（北京：商務印書館，1982），頁390、頁425、頁427-428。

<sup>31</sup> 李零，《兵以詐立——我讀《孫子》》，頁236-237。

軍速度之所以選擇 30 里為一舍，自有其實際戰場經驗之難處。但也有學者認為春秋時代軍隊的行軍能力平均一天可達 30 公里，若加速的話甚至可達 40 公里。<sup>32</sup>

從古代傳舍設置的間隔距離，亦可反映當時人力一天可移動之平均距離。《史記·孝文本紀》載孝文二年（178B.C.），令「太僕見馬遺財足，餘皆以給傳置」。《索隱》：「按：《廣雅》云『置，驛也』。《續漢書》云『驛馬三十里一置』。」<sup>33</sup>《周禮·地官司徒下·遺人》：「凡國野之道，十里有廬，廬有飲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sup>34</sup>可見以漢代的情況而言，人力一天行走 30 里即需休息過夜。

不僅中國如此，西方大秦國亦復如是，《史記·大宛列傳》在提到安息國時言「其西則條支，北有奄蔡、黎軒」，《正義》引《括地志》云：「《魏略》云大秦在安息、條支西大海之西，故俗謂之海西。……其公私宮室為重屋，郵驛亭置如中國。從安息繞海北陸到其國，人民相屬，十里一亭，三十里一置。」<sup>35</sup>據此可知若依中國古代史料，古代西亞人每日移動之平均距離與中國相仿。

不過從古典時期的西方史料可以看出，當時軍隊每天行軍的速度可達 20 公里甚至 30 公里以上。希羅多德（Herodotus, 484B.C.-425B.C.）曾描述當時軍隊在西亞每日行軍的距離是 150 斯塔迪昂（stades），即 5 帕拉桑（parasang），<sup>36</sup>按一帕拉桑約當 5.33 公里

<sup>32</sup> 田中柚美子，〈左傳に見える軍行——戎・狄研究の一助として〉，收入三上次男博士頌壽記念論集編委會編，《三上次男博士頌壽記念東洋史·考古學論集》（東京：朋友書店，1979），頁278-279。

<sup>33</sup> 漢·司馬遷，《史記》，卷 10，〈孝文本紀〉，頁 422。取自司馬彪《續漢書》之《後漢書·輿服志》亦同，見劉宋·范曄，《後漢書》，志第 29，〈輿服志〉，頁 3651。

<sup>34</sup> 十三經注疏整理委員會整理，《周禮注疏》（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頁 408。

<sup>35</sup> 漢·司馬遷，《史記》，卷 123，〈大宛列傳〉，頁 3163。

<sup>36</sup> Herodotus, *Histories*, p. 409; 中譯本參見希羅多德（Herodotus）著，王以鑄譯，《歷史》，頁 362。

(5,328公尺)<sup>37</sup>或3.3英里(5,309公尺),<sup>38</sup>那麼一天即可行軍26.6公里。如果再參考西元前五世紀末色諾芬(Xenophon, 427B.C.-355B.C.)《長征記》(*Anabasis*)的記載,可發現當時希臘軍隊在西亞每天行軍的速度最慢是一天3帕拉桑(約15.96公里),<sup>39</sup>最快曾達一天10帕拉桑(約53.19公里),<sup>40</sup>每天行軍距離平均大致落在5.53帕拉桑(約29.42公里)。<sup>41</sup>羅馬時代的軍事作家波里亞努斯(Polyaenus, 275B.C.-?)更提到亞歷山大(Alexander III of Macedon, 356B.C.-323B.C.)的父親菲利普(Philip II of Macedon, 382B.C.-336B.C.)曾經讓馬其頓人背著武器,同時頭戴鋼盔、脰甲、矛、口糧及日常用具,每天行軍300斯達地亞(stadia, 約54.72公里),<sup>42</sup>羅馬時代的阿里安(Arian, 86-146)曾提及亞歷山大東征時其部隊為追擊大流士(Darius III, 380B.C.-330B.C.),竟在一夜之間急馳400斯台地(Stade)左右,<sup>43</sup>相當於71公里。<sup>44</sup>在羅馬時代,羅馬軍團的訓練則要求士兵一天的行軍速度須達20英里(32公里),而羅馬軍團拉輜重的牛車即使是在最好的道路,一天最長的移動距離是介於28公里至32公里之間。<sup>45</sup>可見在古典時期,希臘與羅馬軍隊每天的行軍距離都較之中國為長。有關希臘羅馬時期西方行軍速度較古代中國為快,個人認為可能與

<sup>37</sup> 帕拉桑為古代波斯所使用之距離單位,參見Ilya Gershevitch, ed.,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Iran, Vol. 2*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pp. 628-629, p. 638.

<sup>38</sup> Xenophon, *Anabasis*, trans. Carleton L. Brownson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p. 56, Brownson 的譯註13。中譯本可參見色諾芬(Xenophon)著,崔金戎譯,《長征記》(北京:商務印書館,1997),頁4。

<sup>39</sup> Xenophon, *Anabasis*, p. 111.

<sup>40</sup> Xenophon, *Anabasis*, p. 59.

<sup>41</sup> 據筆者之統計,參見文末「附錄」。

<sup>42</sup> Victor Davis Hanson, "From Phalanx to Legion," in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Warfare*, ed. Geoffrey Parker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p. 39.

<sup>43</sup> 阿里安(Arian)著,李活譯,《亞歷山大遠征記》(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2001),頁105。

<sup>44</sup> 1帕拉桑相當於30斯台地,故1斯台地約當177.6公尺。參見Ilya Gershevitch ed.,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Iran, Vol. 2*, p. 628, p. 638.

<sup>45</sup> Adrian Keith Goldsworthy, *The Roman Army at War: 100 BC-AD 200*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6), pp. 109-110.

西亞及地中海地區的地理氣候環境偏向乾燥有關，在多雨的地區往往一下雨道路便因泥濘而不堪行走，勢必將嚴重拖延行軍速度。一個著名的例子是秦朝末年陳勝（?-208）與吳廣（?-208）的起義，其反秦原因據《史記·陳涉世家》的記載即是「會天大雨，道不通，度已失期。失期，法皆斬」。<sup>46</sup>這支原本計畫開赴漁陽戍邊的部隊之所以會決意造反，便是因為遭逢大雨而無法按原先規定之時程抵達漁陽，因怕被以延誤軍機的失期之罪論處，所以便索性造反了。

然而在戰爭過程中有時基於戰術需求，軍隊強行軍的情況仍很常見，如阿里安在其《亞歷山大遠征記（VI.6）》一書中提到亞歷山大曾在三天中強行軍 1,500 斯塔迪昂（stades），<sup>47</sup>相當於 266.4 公里，距離相當可觀。<sup>48</sup>即使如此，然仍有各種的因素導致部隊行軍無法依預期速度順利前進，如在西元前 189 年，一支羅馬兵團在小亞細亞為戰利品所累，以致一天行軍不足 6 英里（9.65 公里）。導致行軍緩慢的原因可能與龐大的輜重所產生的問題有關，行軍中存在非常多的變數，道路的狀況、天候、軍隊的構成、輜重車隊的類型和規模、紮營消耗的時間、敵人的遠近以及急行軍的需求，都讓我們難以算出行軍的平均速度。而在蘇格蘭東北部，從考古發掘的兩個羅馬時期營地之間距來看，當時行軍速度緩慢，一天不到 15 英里（24.14 公里）。<sup>49</sup>然在克勞塞維茨所處的十九世紀初，常規一日行軍的距離為 3 普里（約 22.6 公里），但為了讓軍隊得到

<sup>46</sup> 漢·司馬遷，《史記》，卷 48，〈陳涉世家〉，頁 1950。

<sup>47</sup> Arrian, *Anabasis Alexandri*, trans. P. A. Brunt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p. 357. 中譯本參見阿里安（Arrian）著，李活譯，《亞歷山大遠征記》，頁 136。

<sup>48</sup> 1 斯塔迪昂（stade）為 582.5 英尺或 600 英尺，以希臘古制計合 177.6 公尺，1,500 斯塔迪昂（stades）即 266.4 公里。Xenophon, *Anabasis*, p. 79, Brownson 的譯註 34；Ilya Gershevitch ed.,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Iran*, Vol. 2, pp. 628-629, p. 638.

<sup>49</sup> Harry Sidebottom, *Ancient Warfare: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pp. 78-79. 中譯本參見哈里·西德博特姆（Harry Sidebottom）著，晏紹祥譯，《古代戰爭簡史》（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15），頁 122-124。

充分休息，平均一日的行程要減為 2 普里（約 15.1 公里），<sup>50</sup>這個情況其實與兩漢之前的中國行軍距離相去不遠。

#### 四、中亞之退避三舍

戰爭行為中之「退避三舍」不僅出現在古代中國，尤堪注意者，中亞的瑪撒該塔伊人（Massgetae）亦有此俗。希羅多德的《歷史》曾記載瑪撒該塔伊人的女王托米麗司（Tomyris）在面對居魯士攻擊時，曾派使者向居魯士提出這樣的要求：

如果你非常想與瑪撒該塔伊人兵戎相見的話，你現在就不要再費事去架橋了。請容許我們從阿拉克賽斯河向後退三日的路程，然後你再率領軍隊渡河到我們國裡來；否則，如果你願意在你的河岸那邊與我們作戰的話，那你們也請退同樣日程的道路吧。<sup>51</sup>

按重耳言「退避三舍」之事載於魯僖公二十三年，即西元前 637 年，故此俗出現於中國北方至少是在西元前七世紀之時，這種習俗極可能是一種通行於古代內陸歐亞的戰爭傳統。而無論此「退避三舍」之語是出自晉文公或子犯，皆可能與戎狄之傳統有關。蓋晉文公的母親出自狄人，而子犯或狐偃 (?-627B.C.) 即其舅父，<sup>52</sup>《左傳·莊公二十八年》云「晉獻公娶于賈，無子。烝於齊姜，生秦穆夫人及太子申生。又娶二女於戎，大戎狐姬生重耳，小戎子生夷吾。晉伐驪戎，驪戎男女以驪姬，歸，生奚齊，其娣生卓子」，<sup>53</sup>重耳更曾在其母家狄國待過 12 年。<sup>54</sup>其實晉人長期以來一

<sup>50</sup> 克勞塞維茨（Carl von Clausewitz）著，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院譯，《戰爭論》，頁 421。

<sup>51</sup> Herodotus, *Histories*, p. 92; 希羅多德（Herodotus）著，王以鑄譯，《歷史》，頁 101。

<sup>52</sup> 《國語·晉語四》云：「晉公子亡，長幼矣，而好善不厭，父事狐偃，師事趙衰，而長事賈佗長。狐偃，其舅也，而惠以有謀。」參見徐元誥撰，王樹民、沈長雲點校，《國語集解》，頁 329。

<sup>53</sup> 楊伯峻，《春秋左傳注》，頁 238-239；另參見漢·司馬遷，《史記》，卷 39，〈晉世家〉，頁 1641。

直與狄人頻繁通婚，<sup>55</sup>如前引晉獻公（危諸，676B.C.-651B.C.）之子除太子申生（?-655B.C.）外，重耳、夷吾（?-637B.C.）、奚齊（665B.C.-651B.C.）、卓子（?-651B.C.）之母皆為戎狄，晉文公本人亦娶狄女為妻。《史記·晉世家》云「狄伐咎如，得二女：以長女妻重耳，生伯儻、叔劉；以少女妻趙衰，生盾」，<sup>56</sup>此咎如者，《左傳》作麶咎如，<sup>57</sup>陳槃認為麶咎如屬白狄，<sup>58</sup>但學界多認為屬赤狄，<sup>59</sup>足見晉文公的血統與婚姻皆有很深的戎狄色彩。因此從晉文公「退避三舍」的這個歷史事件來看，晉國上層統治階級行為所展現的「內亞性」，應與晉國王室長期與戎狄通婚的傳統脫離不了關係。其實晉國自立國之初起，即長期與戎狄雜處，《左傳·定公四年》言唐叔虞始封時「命以唐誥而封於夏虛，啟以夏政，疆以戎索」、「戎狄之與鄰」（《左傳·昭公十五年》）。<sup>60</sup>可見晉國所在之山西地區，其環境原先便有濃厚的戎狄歷史背景，<sup>61</sup>因此晉文公「退避三舍」

<sup>54</sup> 《史記·晉世家》云：「獻公二十二年，獻公使宦者履鞮，趣殺重耳。重耳踰垣，宦者逐斬其衣祛。重耳遂奔狄。狄，其母國也。……重耳居狄凡十二年而去。」參見漢·司馬遷，《史記》，卷39，〈晉世家〉，頁1656-1657。

<sup>55</sup> 田中柚美子，〈晉と戎・狄——獻公の婚姻關係を中心として——〉，《國學院雜誌》，76：3（東京，1975.3），頁23-37；石本利宏，〈先秦期における中原と北方の關係について——晉における北方民との婚姻を中心に——〉，《研究論集》，9（名古屋，2012.3），頁7-17。

<sup>56</sup> 漢·司馬遷，《史記》，卷39，〈晉世家〉，頁1657。

<sup>57</sup> 楊伯峻，〈春秋左傳注〉，頁405、頁812、頁814。

<sup>58</sup> 陳槃，〈春秋宗、房、不羹、麶咎如、驪戎、山戎、茅戎、陸渾之戎別紀〉，《孔孟學報》，14（臺北，1967.9），頁150。

<sup>59</sup> 杜正勝，〈西周封建的特質——兼論夏政商政與戎索周索〉，收入杜正勝編，《中國上古史論文選集》（臺北：華世出版社，1979），頁677；楊純淵，〈春秋山西北狄考〉，收入山西省考古學會、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編，《山西省考古學會論文集（一）》（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頁119；斯維至，〈北狄與赤狄白狄考辨〉，《大陸雜誌》，94：3（臺北，1997.3），頁26；楊建華，〈《春秋》與《左傳》中所見的狄〉，《史學集刊》，1999：2（長春，1999.5），頁18-19；佐藤長，〈春秋期の狄について〉，收入佐藤長，《中國古代史論考》（京都：朋友書店，2000），頁222-227；吉本道雅，〈史記匈奴列伝疏証——上古から冒頓單于まで——〉，《京都大學文學部研究紀要》，45（京都，2006.3），頁55。

<sup>60</sup> 楊伯峻，〈春秋左傳注〉，頁1539、頁1371。

<sup>61</sup> 杜正勝即認為所謂「夏政」與「戎索」都是為了適應當地原有之戎狄生態情勢，參見杜正勝，〈西周封建的特質——兼論夏政商政與戎索周索〉，頁675-679、頁

的事件可能與戎狄的軍事習俗有關，而這些中國北方的戎狄，與日後內亞的游牧民族在文化上應有某種的共同淵源。

我們若檢視托米麗司要求居魯士「退避三舍」的時間，可以發現中亞的「退避三舍」在文獻出現的時間要晚於晉文公與楚成王的故事。按居魯士最後死於托米麗司之手，年代為西元前 529 年；<sup>62</sup>反觀晉文公言楚成王「退避三舍」的時間則在西元前 637 年，故此類「退避三舍」的傳統在中國北方出現的時間並不晚於中亞，至少就目前的文獻資料來看甚至早於中亞，故此種軍事傳統或許在內陸歐亞東部有著更早的起源。

## 五、從「退避三舍」思索古代中國北方與內亞間的文化互動關係

要如何看待史料中古代中國的晉文公與中亞瑪撒該塔伊人先後分別出現「退避三舍」的記載，此二者之間的關係究係如何？一種可能的解釋是兩者間並無關係，中國北方與中亞兩地出現此種類似的風俗當係純屬巧合。而欲證明此二者有文化上之親緣關係，最好必須在現在的新疆或南西伯利亞一帶找到西元前六世紀前後的類似風俗，方可進一步論證此二者間存有某種的文化親緣性。但在此一失落的環節尚未出現之前，我們是否也可嘗試探討此二者間存有關聯的可能性？在考量遠距離兩地間的歷史類同性是否僅是出於偶然的情況時，或許應考量到這種偶然出現的或然率問題。「退避三舍」是個非常特殊的異例，中國春秋時代的戰爭次數不少，但類似的案例在中國先秦史中僅出現在晉文公身上，我們並無在他處看到類似「退避三舍」的案例，足見這種習俗並非是一般社會容易萌生的慣習，那麼當遠在中亞的瑪撒該塔伊人也出現一模一樣的說法時，此兩者間存在著某種親緣性關係的選項是否亦應納入考量（譬如說為何不是退避二舍或一舍）。近年來學界已重新評估人類在史前時期的長距離移動能力，學者發現遠自

683-687。

<sup>62</sup> Ilya Gershevitch ed.,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Iran*, Vol. 2, p. 392.

史前時期開始，人類即已經常實踐長距離的移動與物資交流。<sup>63</sup>即使進入歷史時期，非洲與歐亞大陸上的人群長距離交流與互動依然非常活絡，<sup>64</sup>如近來在英國倫敦泰晤士河南岸南華克（Southwark）的西元二世紀至四世紀羅馬時期遺址所發掘的22具骸骨中，從骨骼型態學分析至少發現了兩個可能是亞洲人（來自中國奴隸？）的骨骼（先前考古所發現羅馬時期位置最西的亞洲人遺骨是位於義大利之凡那利〔Vagnari〕），便是一個很好的例證。<sup>65</sup>柯瑙爾（Elfriede R. Knauer）的研究指出，在東漢畫像石墓中所出現的人首蛇身伏羲女媧交尾圖，此母題明顯是受到埃及伊西斯——賽拉匹斯蛇神（Isis-Thermouthis & Serapis-Agathodaimon）信仰的影響（參見「圖1」），此類母題在西方可追溯至西元前兩千多年西亞的阿卡德人（Akkadian）與蘇美人時期遺物，此種人首蛇身交尾母題也影響了漢代畫像石中的西王母圖像（參見「圖2」、「圖3」），<sup>66</sup>由此可見古代東西方長距離的文化接觸與交流，經常超越現今人們的想像之外。

<sup>63</sup> 有關這方面的研究成果，參見 Peter N. Peregrine, Ilia Peiros, and Marcus Feldman ed., *Ancient Human Migrations: A Multidisciplinary Approach* (Salt Lake City: University of Utah Press, 2009); Peter Bellwood, ed., *The Global Prehistory of Human Migration* (Malden: Wiley Blackwell, 2015).

<sup>64</sup> Victor H. Mair, ed., *Contact and Exchange in the Ancient World*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6). 晚期鐵器時代歐亞大陸上的長距離文化互動，參見 Ursula B. Brosseder, "A Study on the Complexity and Dynamics of Interaction and Exchange in Late Iron Age Eurasia," in *Complexity of Interaction along the Eurasian Steppe Zone in the first Millennium CE*, ed. Jan Bemmann & Michael Schmauder (Bonn: Vor-und Frühgeschichtliche Archäologie, Rheinische Friedrich-Wilhelms-Universität, 2015), pp. 199-332.

<sup>65</sup> Rebecca C. Redfern, et al., "Going south of the river: A multidisciplinary analysis of ancestry, mobility and diet in a population from Roman Southwark, London," *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Science*, 74 (October, 2016), pp. 11-22.

<sup>66</sup> Elfriede R. Knauer, "The Queen Mother of the West: A Study of the Influence of Western Prototypes on the Iconography of the Taoist Deity," in *Contact and Exchange in the Ancient World*, ed. Victor H. Mair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6), p. 81, pp. 92-93, p. 109; 有關漢代畫像石中的西方文化因素，可參見繆哲，〈漢代藝術中外來母題舉例——以畫像石為中心〉（南京：南京師範大學美術學院博士論文，2007）。



Figure 3.52. (Left) Small bronze from Roman Egypt. (From Roscher 1965, 2:1, s.v. "Isis," 538; by permission of Georg Olms Verlag)

Figure 3.53. (Above) Rubbing of stone relief from Mamaozhuang, Shanxi. (From Wenwu 1992 [4]: 47; by permission of the Cultural Relics Publishing House, Beijing)

### 圖 1 埃及伊西斯——賽拉匹斯蛇神（Isis-Thermouthis & Serapis-Agathodaimon）信仰與東漢畫像石伏羲女媧圖之比較

資料來源：

Knauer, Elfriede R. "The Queen Mother of the West: A Study of the Influence of Western Prototypes on the Iconography of the Taoist Deity." In *Contact and Exchange in the Ancient World*, edited by Victor H. Mair, p. 93.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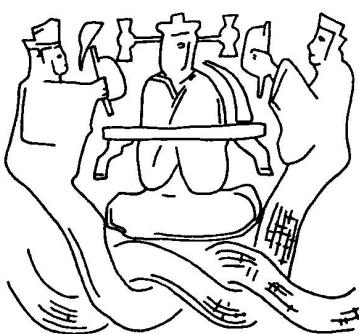


Figure 3.28. Drawing of stone relief from Tengxian, Shandong. (From Loewe 1979, 107, fig. 18; by permission of Harper Collins Publishing)

### 圖 2 山東滕州畫像石中的西王母圖像（摹本）

資料來源：

Knauer, Elfriede R. "The Queen Mother of the West: A Study of the Influence of Western Prototypes on the Iconography of the Taoist Deity." In *Contact and Exchange in the Ancient World*, edited by Victor H. Mair, p. 81.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6.



圖3 山東滕州畫像石中的西王母圖像（原拓本）

資料來源：

賴非主編，《中國畫像石全集2·山東漢畫像石》，濟南：山東美術出版社，2000，頁196，圖版204。

本文在此願先提出一種可能性的討論，即古代中國北方人群與中亞瑪撒該塔伊人在文化上是否存在著某種內亞共享的戰爭文化的可能？而這又能讓我們重新思索古代內亞文化的起源問題。有關內亞文化的起源，是學術界的一個重大議題。先前學界較強調斯基泰（Scythian）文化的關鍵影響性，但學界已開始反省這樣的思維，而如欲解決此問題，觀察的時間勢必要上溯至商代。如高去尋先生很早就注意到商代黃河下游屈肢葬的來源問題，並指出屈肢葬與內亞文化有很深的淵源。<sup>67</sup>中國北方與蒙古草原之間，長期以來存在著一個所謂的「農牧交錯帶」，此地帶約與年降雨量

<sup>67</sup> 高去尋，〈黃河下游的屈肢葬問題〉，《中國考古學報》，2（北平，1947.3），頁121-166。

400 公釐等值線相當，而這正是農業生產需求雨量的底線。<sup>68</sup>這一地帶不但有農有牧，而且是時農時牧，歷史上曾出現多次農業文化與牧業文化的交替與興衰。<sup>69</sup>賴德懋（Owen Lattimore, 1900-1989）很早便意識到這個區域對中國早期歷史的重要性，他將此一區域視為是一個草原與農耕文明的「過渡地帶」，是游牧勢力往中國本部發展的「蓄水池」。<sup>70</sup>研究指出距今 3500 多年前中國北方經歷過一次變乾且變冷的過程，<sup>71</sup>周朝的氣候雖然最初溫暖，但不久就惡化了，《竹書紀年》的記載曾顯示西元前十世紀時期的寒冷。然到春秋時期，氣候又再度和暖，而且延續到戰國時期。<sup>72</sup>在氣候冷暖變遷時期，此區域的平均降雨差別可達 100 公釐以上。<sup>73</sup>在戰國中晚期，可能因為氣候的暖化，華夏農業民族的勢力一再地向北擴張，他們為了鞏固對此一可農可牧過渡地帶的控制權，便將這個地區進一步「邊界化」，於是出現了秦、趙、燕的長城。一如王明珂所指出，長城的建立，可說是北方華夏諸國對於擴張資源的需求。<sup>74</sup>但我們不該忽略在寒冷時期，若也存在一個農牧分界線的話，這個農、牧世界的邊界應比戰國晚期長城的位置還要更南，這時北方牧業族群的勢力是可以往南擴展，所以黃河以北的華北一帶可能就成為草原文化的影響區，甚至是發展區。正在起源發

<sup>68</sup> 韓茂莉，〈歷史時期中國疆域伸縮的地理基礎〉，《中國文化研究》，2016：2（北京，2016.5），頁 77。

<sup>69</sup> 張蘭生等，〈我國北方農牧交錯帶的環境演變〉，《地學前沿》，4：1-2（北京，1997.3），頁 127。

<sup>70</sup> Owen Lattimore, *Inner Asian Frontiers of China*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pp. 238-251.

<sup>71</sup> 韓茂莉，〈論中國北方畜牧業產生與環境的互動關係〉，《地理研究》，22：1（北京，2003.1），頁 92、頁 94。

<sup>72</sup> 竺可楨，〈中國近五千年來氣候變遷的初步研究〉，《考古學報》，1972：1（北京，1972.12），頁 19-20。

<sup>73</sup> 方修琦，〈從農業氣候條件看我國北方原始農業的衰落與農牧交錯帶的形成〉，《自然資源學報》，14：3（北京，1999.7），頁 215。

<sup>74</sup> 王明珂，〈鄂爾多斯及其鄰近地區專化遊牧業的起源〉，《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65：2（臺北，1994.6），頁 416；王明珂，〈遼西地區專化遊牧業的起源——兼論華夏邊緣的形成〉，《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67：1（臺北，1996.3），頁 227。

展中的內亞草原游牧文化，其某些文化成分或許正來自於華北這個農牧文化的交替區。

賴德懋很早就提示我們必須認清邊疆與邊界的區別，<sup>75</sup>李峰亦曾表明那種單線形的邊界（liner border）在中國早期國家中並不存在，而所謂的邊疆，實際上是一個諸種文化相互影響和滲透的邊疆區域（frontier zone）。<sup>76</sup>賴德懋明智的指出後來漢族所面對的草原游牧民族，其古代的起源可追溯至發生在中國黃河河套附近的一個環境中的變化，而正因如此才產生了「華夏漢族」與「戎狄」。<sup>77</sup>直至春秋時期，戎狄與華夏還是呈現雜居的狀態，彼此間甚至還燈火相望，<sup>78</sup>戎狄亦曾與華夏諸國有過會盟關係。<sup>79</sup>戎狄與華夏間頻繁的接觸以及通婚，也使得內亞的文化因素不斷在華北地區出現，這在考古出土文物上都有某種程度的顯示。如陝西寶雞益門村2號墓的馬具、牌飾和短劍，都反映了同內陸歐亞草原的聯繫，羅泰（Lothar von Falkenhausen）認為在此時已開始後世所謂的「胡風」了，關中的豐京甚至早在西周時期，也可能因為這種貴族間的異族婚姻而展露出某種國際都會的氛圍。<sup>80</sup>

另一個更值得關注的問題點是中國北方地區在這段期間中，正處於農耕與游牧兩種生業型態的競合期。此一農牧交錯帶一方

<sup>75</sup> Owen Lattimore, *Inner Asian Frontiers of China*, p. 238.

<sup>76</sup> 李峰，〈論西周王朝西北邊疆的文化生態〉，收入許倬雲、張忠培主編，《新世紀的中國考古學——文化、區位、生態的多元互動》（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6），頁172。

<sup>77</sup> Owen Lattimore, *Inner Asian Frontiers of China*, p. 278.

<sup>78</sup> 《左傳·哀公十七年》：「初，公（衛莊公）登城以望，見戎州。問之，以告。公曰：『我，姬姓也，何戎之有焉？』翦之。」參見楊伯峻，《春秋左傳注》，頁1710。此戎州當為戎人保聚於帝邱城外以居者。參見趙鐵寒，〈春秋時期的戎狄地理分布及其源流（上）〉，《大陸雜誌》，11：2（臺北，1955.8），頁11。

<sup>79</sup> 渡邊英幸，〈春秋時代の國際会盟と華夷秩序〉，收入入間田宣夫編，《日本・東アジアの國家地域人間——歴史學と文化人類學の方法から》（仙台：入間田宣夫先生還暦記念論集編集委員會，2002），頁6-32。

<sup>80</sup> Lothar von Falkenhausen, *Chinese Society in the Age of Confucius (1000-250 BC): The Archaeological Evidence*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2006), p. 212, pp. 224-227, p. 233.

面是中原的邊緣，另一方面也是農業與游牧的「過渡地帶」。<sup>81</sup>中國北方人群長期游移在這兩種生業型態之中，時而較重農耕，時而又重放牧。這也是周人為何會有「自竄於戎狄之間」（《國語·周語》）的經歷，<sup>82</sup>而秦人子孫會「或在中國，或在夷狄」的一個歷史大背景（context）。終於約在春秋之際，兩種生業型態完成了關鍵性的分離，自此華夏與戎狄之別日趨明顯，「攘夷」也隨之成為華夏凝聚族群意識的一種口號。因此某些內亞文化的重要成分，是否在農耕與游牧這兩種生業型態尚未截然區分之前，就已經在中國北方地區成形。由於周秦早期活動的內亞性格歷史事件，有不少發生的時間都早於西方游牧民族出現於歷史文獻的西元前八世紀，故內亞文化是以斯基泰系文化為主體的觀點便值得重新審視。有關早期中國周秦等民族文化中的「戎狄性」問題，可能一如學者所指出的，應是與長期以來雙方在北方地區的族群互動影響有關；<sup>83</sup>但亦不能排除這些被視為有內亞特色的戎狄文化成分，其實可能源自該區一些更古老的文化傳統。因此中國華北的早期居民，無論是華夏或戎狄，有可能都是日後內亞文化的締造者之一，他們也長期共享某些內亞的文化現象。誠如羅新所點明的：

中國史與內亞史的這種重疊交叉當然不是偶發的、孤立的，而是貫穿全部中國歷史的。……中國史又與內亞史有著無法切割不可分離的重疊。……內亞史從來就沒有、或絕少有可能不與中國史發生或淺或深的接觸、交叉乃至重疊。完全脫離了中國史的內亞史，甚至不可能被紀錄、被敘述、被了解，而成為永久消失了的過去。同樣，中國史

<sup>81</sup> 史黨社，〈多彩的邊疆——考古材料所見公元前7-3世紀秦之西北邊地文化〉，收入蔡慶良、張志光主編，《嬴秦溯源》（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16），頁323。

<sup>82</sup> 徐元誥撰，王樹民、沈長雲點校，《國語集解》，頁3-4。

<sup>83</sup> 杜正勝，〈秦社會的「戎狄性」〉，收入杜正勝，《編戶齊民》（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0），頁459-466；杜正勝，〈周秦民族文化「戎狄性」的考察〉，《大陸雜誌》，87：5（臺北，1993.11），頁1-25。

從來就沒有缺少過內亞因素的參與，這種參與有時甚至決定了中國歷史發展的走向。<sup>84</sup>

陳三平也指出：

考古資料清楚表明在史前與早期的歷史中，廣闊的歐亞大陸都表現出是一個文化連續體。在西元前最後一個千紀，早期的「華夏」與「戎狄」共同一起生活在中國北方，並且彼此間不僅在政治、文化，甚至在婚姻上都有密切的互動關係，這種情況幾乎一直延續到秦統一中國的前夕。<sup>85</sup>

套用語言學的術語，在早期中國北方地區的文化成分中，或曾存在過一種內亞的「底層」(substratum)，<sup>86</sup>此種內亞文化成分雖然在戰國之後隨著華夏的崛起而逐漸弱化，不易被人們所察覺，但其中部分源自中國北方地區的內亞文化卻繼續在草原內亞地區持續的流行，甚至得到了強化，這是我們在觀察內亞歷史文化發展脈絡時不能忽視的一個重要面向。我們也不能忽略在語言的研究上，有學者主張早期的漢語與阿爾泰語曾經有過聯繫。<sup>87</sup>一如前

<sup>84</sup> 羅新，〈內亞視角的北朝史〉，頁114。

<sup>85</sup> Chen, Sanping, *Multicultural China in the Early Middle Ages*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2012), p. 145. 中譯本可參見陳三平著，賴芊暉譯，《木蘭與麒麟：中古中國的突厥—伊朗元素》（新北：八旗文化，2019），頁215。

<sup>86</sup> 語言學上所謂「底層」(substratum or substrate)，係指一個民族放棄本族的語言而使用另一種語言時，往往會將舊的語言習慣（如語音、詞彙、語法）帶到新的語言之中，形成新語言底下的一層語言現象，而原本的舊語言在某些情況下可能已經消亡。或指已被入侵語言覆沒的當地民族（原始）語，也指當地語言對占強勢地位的外來征服者語言所造成的影响。參見陳新雄等編，《語言學辭典》（臺北：三民書局，1989），頁116；另參見哈杜墨德·布斯曼 (Hadumod Bussmann) 著，陳慧瑛等編譯，《語言學詞典》（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頁533；馬修斯 (P. H. Matthews) 編，《牛津語言學詞典》(Oxford Concise Dictionary of Linguistics)（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00），頁361-362；R. L. Trask, *The Dictionary of Historical and Comparative Linguistics* (北京：世界圖書出版公司，2011影印本)，p. 328；Lyle Campbell, ed., *Historical Linguistics—An Introduction*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1998), p. 285；周振鶴、游汝杰，《方言與中國文化》（臺北：南天書局，1990），頁209-211。

<sup>87</sup> 趙尺子，〈「漢蒙語文比較學」零簡〉，收入趙尺子，《蒙漢語文比較學舉隅》，

述，中國北方遲至春秋時期還是處於一種戎狄與華夏雜居的情況，雖然有文獻證據顯示戎人在語言風俗上與諸夏存在著差異，<sup>88</sup>但此種差異是否是不同語系間的差異？目前尚不得而知。但已有研究指出中國北方華夏族群的語言疑似混有阿爾泰語，而且中國北方甚至有可能是阿爾泰語族的原鄉。<sup>89</sup>因此有關早期中國歷史文化與內亞文化之間的親緣性問題，值得學界投入更進一步的探索研究。

## 六、結論

退避三舍這個春秋時代的著名典故，除反映了中國古代的軍事文化之外，透過與中亞地區的文化比較，也透露出一些以往為學界所忽略的歷史訊息。首先，退避三舍反映出中國古代戰爭中的貴族傳統，即強調「君子之爭」的優雅風範或「不趁人之危」的高貴情操。其二，透過與西方歷史的比較，可以明瞭古代行軍速度頗受地形地貌與氣候環境之限制，加上尚需運送輜重，古代中國直至漢代，一天行軍的平均距離約 30 里至 50 里，約當現今 12 公里至 21 公里之間。較之古代西亞及地中海地區的每日行軍距離 20 公里至 30 公里，中國古代的行軍距離似乎較短。其三，最值得注意的是中亞的古代游牧民族瑪撒該塔伊人，其在與波斯王居魯士二世作戰的過程中也有類似中國的「退避三舍」之俗，顯示中國與中亞地區在某些軍事習俗上存在著一致性，就發生時間而言

(臺北：中國邊疆語文研究會，1969），頁 354-358；趙尺子，〈史記匈奴傳譯名新釋〉，收入趙尺子，《蒙漢語文比較學舉隅》（臺北：中國邊疆語文研究會，1969），頁 90-140；徐松石，〈匈奴蒙古民族考〉，收入徐松石，《日本民族的淵源》（香港：東南亞研究所，1966），頁 144-161；徐丹，〈從借詞看西北地區的語言接觸〉，《民族語文》，2015：2（北京，2015.4），頁 29-33；Sergei A. Starostin & Ilia Peiros, “Altaic loans in Old Chinese,” in *Past Human Migrations in East Asia*, ed. Alicia Sanchez-Mazas et. al.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8), pp. 254-262.

<sup>88</sup> 《左傳·襄公十四年》曾載戎子駒支對范宣子說：「我諸戎飲食衣服，不與華同，贊幣不通，言語不達，何惡之能為？」參見楊伯峻，《春秋左傳注》，頁 1007。

<sup>89</sup> Sergei A. Starostin & Ilia Peiros, “Altaic loans in Old Chinese,” pp. 254-262.

中國似乎還早於中亞。雖然目前在新疆或南西伯利亞地區的古代歷史記載中，尚未發現能夠證明此二者間有直接關係的「失落環節」史料，但古代中國北方與內亞文化圈之間的互動問題仍值得學界關注。中國北方地區在古代由於氣候的冷暖波動，長期以來一直屬於所謂的「農牧交錯帶」，早期在該區活動的戎狄與日後活躍於內亞草原的游牧民族，在文化上似乎有某種的關連性。或許在古代中國北方所孕育出的某些文化現象，後來分別被華夏民族與內亞民族所共享，如比亞尼科夫（И. В. Пьянков）即主張斯基泰文化中的野獸風格，極可能是源自內亞東南部活躍於華北地區的戎狄。<sup>90</sup>因此中國華北的早期居民，無論是華夏或戎狄，有可能都是日後所謂內亞文化的締造者之一，他們也長期共享某些內亞的文化成分，這是我們在看待早期中國文明時極應留意的一個文化現象。

（責任編輯：王亭方 校對：林晉歲）

<sup>90</sup> И. В. 比亞尼科夫（И. В. Пьянков）著，孫危譯，〈戎與狄，阿里馬斯巴人（獨目人）與亞馬遜人〉，收入余太山、李錦繡主編，《歐亞譯叢》，第4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8），頁1-37。

附錄 色諾芬《長征記》所載行軍距離統計表

| 站(即一天) | 帕拉桑 | 一站平均 | 中譯本頁碼 | 英文本頁碼 | 備註 |
|--------|-----|------|-------|-------|----|
| 3      | 22  | 7.3  | 4     | 57    | —  |
| 1      | 8   | 8    | 4     | 57    | —  |
| 3      | 20  | 6.7  | 4     | 57    | —  |
| 2      | 10  | 5    | 5     | 59    | —  |
| 2      | 12  | 6    | 5     | 59    | —  |
| 3      | 30  | 10   | 5     | 59    | —  |
| 2      | 10  | 5    | 6     | 61    | —  |
| 2      | 10  | 5    | 6     | 61    | —  |
| 3      | 20  | 6.7  | 7     | 63    | —  |
| 5      | 30  | 6    | 7     | 65    | —  |
| 4      | 25  | 6.25 | 7     | 65    | —  |
| 4      | 25  | 6.25 | 8     | 67    | —  |
| 2      | 10  | 5    | 12    | 79    | —  |
| 1      | 5   | 5    | 12    | 79    | —  |
| 2      | 15  | 7.5  | 12    | 79    | —  |
| 1      | 5   | 5    | 13    | 81    | —  |
| 1      | 5   | 5    | 13    | 83    | —  |
| 4      | 20  | 5    | 14    | 85    | —  |
| 5      | 30  | 6    | 15    | 85    | —  |
| 3      | 15  | 5    | 15    | 85    | —  |
| 9      | 50  | 5.56 | 16    | 91    | —  |
| 5      | 35  | 7    | 16    | 91    | —  |
| 13     | 90  | 6.92 | 17    | 93    | —  |
| 3      | 12  | 4    | 22    | 105   | —  |
| 1      | 3   | 3    | 24    | 111   | —  |

| 站（即一天） | 帕拉桑 | 一站平均 | 中譯本頁碼 | 英文本頁碼   | 備註 |
|--------|-----|------|-------|---------|----|
| 4      | 20  | 5    | 49    | 185     | —  |
| 6      | 30  | 5    | 50    | 187     | —  |
| 4      | 20  | 5    | 50    | 187     | —  |
| 1      | 6   | 6    | 77    | 265     | —  |
| 1      | 4   | 4    | 77    | 267     | —  |
| 2      | 10  | 5    | 96    | 325     | —  |
| 3      | 15  | 5    | 96    | 325、327 | —  |
| 3      | 15  | 5    | 97    | 327     | —  |
| 3      | 15  | 5    | 99    | 333     | —  |
| 3      | 13  | 4.3  | 99    | 333     | —  |
| 1      | 5   | 5    | 103   | 347     | —  |
| 5      | 30  | 6    | 106   | 355     | —  |
| 7      | 50  | 7.14 | 108   | 361     | —  |
| 4      | 20  | 5    | 108   | 363     | —  |
| 4      | 20  | 5    | 108   | 363     | —  |
| 3      | 10  | 3.33 | 109   | 367     | —  |
| 2      | 7   | 3.5  | 112   | 375     | —  |
| —      | —   | 5.53 | —     | —       | 平均 |

資料來源：

Xenophon, *Anabasis*. Translated by Carleton L. Brownson.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色諾芬 (Xenophon) 著，崔金戎譯，《長征記》，北京：商務印書館，1997。

## 引用書目

### 一、文獻史料

春秋·孫武撰，三國·曹操等注，楊丙安校理，《十一家注孫子校理》，北京：中華書局，1999。

漢·司馬遷，《史記》，點校本，北京：中華書局，1959。

漢·班固，《漢書》，點校本，北京：中華書局，1962。

漢·荀悅，《漢紀》，收入張烈點校，《兩漢紀》，北京：中華書局，2002。

劉宋·范曄，《後漢書》，點校本，北京：中華書局，1965。

十三經注疏整理委員會整理，《周禮注疏》，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

色諾芬（Xenophon）著，崔金戎譯，《長征記》，北京：商務印書館，1997。

希羅多德（Herodotus）著，王以鑄譯，《歷史》，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7。

阿里安（Arrian）著，李活譯，《亞歷山大遠征記》，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2001。

徐元誥撰，王樹民、沈長雲點校，《國語集解》，北京：中華書局，2002。

楊伯峻，《春秋左傳注》，北京：中華書局，1995。

劉仲平註譯，《司馬法今註今譯》，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7。

Arrian, *Anabasis Alexandri*. Translated by P. A. Brunt.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Herodotus, *Hisorties*. Translated by George Rawlinson. New York: Wordsworth Editions Limited, 1996.

Xenophon, *Anabasis*. Translated by Carleton L. Brownson.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 二、近人專書

克勞塞維茨（Carl von Clausewitz）著，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院譯，《戰爭論》，北京：商務印書館，1982。

- 呂學明，《中國北方地區出土的先秦時期銅刀研究》，北京：科學出版社，2010。
- 李水城，《東風西漸——中國西北史前文化之進程》，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
- 李剛，《中國北方青銅器的歐亞草原因素》，北京：文物出版社，2011。
- 李海榮，《北方地區出土夏商周時期青銅器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
- 李零，《兵以詐立——我讀《孫子》》，北京：中華書局，2006。
- 周振鶴、游汝杰，《方言與中國文化》，臺北：南天書局，1990。
- 哈里·西德博特姆（Harry Sidebottom）著，晏紹祥譯，《古代戰爭簡史》，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15。
- 烏恩，《北方草原考古文化比較研究》，北京：科學出版社，2008。
- 烏恩，《北方草原考古文化研究》，北京：科學出版社，2007。
- 高銳，《中國上古軍事史》，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1995。
- 陳三平著，賴芊暉譯，《木蘭與麒麟：中古中國的突厥—伊朗元素》，新北：八旗文化，2019。
- 陳洪，《秦文化之考古學研究》，北京：科學出版社，2016。
- 傑弗里·帕克（Geoffery Parker）著，傅景川等譯，《劍橋戰爭史》，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
- 黃樸民，《中國軍事通史·第二卷 春秋軍事史》，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1998。
- 楊建華，《北方先秦考古研究》，北京：科學出版社，2015。
- 楊建華，《春秋戰國時期中國北方文化帶的形成》，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
- 楊建華、蔣剛主編，《公元前2千紀的晉陝高原與燕山南北》，北京：科學出版社，2008。
- 楊建華等，《歐亞草原東部的金屬之路：絲綢之路與匈奴聯盟的孕育過程》，北京：文物出版社，2016。
- 潘玲，《中國北方晚期鑄研究》，北京：科學出版社，2015。

賴非主編，《中國畫像石全集 2·山東漢畫像石》，濟南：山東美術出版社，2000。

韓金秋，《夏商西周中原的北方系青銅器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

韓建業，《中國西北地區先秦時期的自然環境與文化發展》，北京：文物出版社，2008。

Bellwood, Peter, ed. *The Global Prehistory of Human Migration*. Malden: Wiley Blackwell, 2015.

Campbell, Lyle ed. *Historical Linguistics—An Introduction*.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1998.

Chen, Sanping. *Multicultural China in the Early Middle Ages*.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2012.

Falkenhausen, Lothar von. *Chinese Society in the Age of Confucius (1000-250 BC): The Archaeological Evidence*.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2006.

Gershevitch, Ilya, ed.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Iran, Vol. 2*.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Goldsworthy, Adrian Keith. *The Roman Army at War: 100 BC-AD 200*.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6.

Lattimore, Owen. *Inner Asian Frontiers of China*.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Mair, Victor H., ed. *Contact and Exchange in the Ancient World*.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6.

Minns, Ellis H. *Scythians and Greeks*. New York: Biblo and Tannen, 1971.

Peregrine, Peter N., Ilia Peiros, and Marcus Feldman, eds. *Ancient Human Migrations: A Multidisciplinary Approach*. Salt Lake City: University of Utah Press, 2009.

Shelach, Gideon. *Prehistoric Societies on the Northern Frontiers of China*. London; Oakville, CT: Equinox Pub., 2009.

Sidebottom, Harry. *Ancient Warfare: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Twitchett, Denis and Michael Loewe, eds.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ume 1, The Ch'in and Han Empires, 221 B.C.-A.D. 220*.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 三、近人論文

И. В. 比亞尼科夫（И. В. Пьянков）著，孫危譯，〈戎與狄，阿里馬斯巴人（獨目人）與亞馬遜人〉，收入余太山、李錦繡主編，《歐亞譯叢》，第4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8，頁1-37。

方修琦，〈從農業氣候條件看我國北方原始農業的衰落與農牧交錯帶的形成〉，《自然資源學報》，14：3，北京，1999.7，頁212-218。

王一凡，〈北宋時期內亞因素對中原漢文化之影響〉，《中原文物》，2017：1，鄭州，2017.2，頁35-42。

王明珂，〈鄂爾多斯及其鄰近地區專化遊牧業的起源〉，《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65：2，臺北，1994.6，頁375-434。

王明珂，〈遼西地區專化遊牧業的起源——兼論華夏邊緣的形成〉，《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67：1，臺北，1996.3，頁195-238。

史黨社，〈多彩的邊疆——考古材料所見公元前7-3世紀秦之西北邊地文化〉，收入蔡慶良、張志光主編，《嬴秦溯源》，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16，頁316-323。

史黨社，〈秦關北望——秦與「戎狄」文化的關係研究〉，上海：復旦大學歷史系博士論文，2008。

李東海，〈「退避三舍」之分析〉，《語文教學通訊·D刊（學術刊）》，2012：Z1，太原，2012.8，頁183-186。

李峰，〈論西周王朝西北邊疆的文化生態〉，收入許倬雲、張忠培主編，《新世紀的中國考古學——文化、區位、生態的多元互動》，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6，頁171-204。

杜正勝，〈西周封建的特質——兼論夏政商政與戎索周索〉，收入杜正勝編，《中國上古史論文選集》，臺北：華世出版社，1979，頁653-696。

杜正勝，〈周秦民族文化「戎狄性」的考察〉，《大陸雜誌》，87：5，臺北，1993.11，頁1-25。

- 杜正勝，〈秦社會的「戎狄性」〉，收入杜正勝，《編戶齊民》，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0，頁 459-466。
- 祁美琴、陳駿，〈中國學者研究中的「內亞」概念及其問題反思〉，《中國人民大學學報》，2019：3，北京，2019.5，頁 163-172。
- 竺可楨，〈中國近五千年來氣候變遷的初步研究〉，《考古學報》，1972：1，北京，1972.12，頁 15-38。
- 徐丹，〈從借詞看西北地區的語言接觸〉，《民族語文》，2015：2，北京，2015.4，頁 23-35。
- 徐松石，〈匈奴蒙古民族考〉，收入徐松石，《日本民族的淵源》，香港：東南亞研究所，1966，頁 144-161。
- 桑原鷺藏著，仇在廬譯，〈漢里之賓長〉，《禹貢》，4：2，北平，1935.9，頁 12。
- 高去尋，〈黃河下游的屈肢葬問題〉，《中國考古學報》，2，北平，1947.3，頁 121-166。
- 張高評，〈《左傳》敘戰徵存兵法謀略〉，《古典文學知識》，2018：3，南京，2018.5，頁 125-135。
- 張蘭生等，〈我國北方農牧交錯帶的環境演變〉，《地學前沿》，4：1-2，北京，1997.3，頁 131-140。
- 陳槃，〈春秋宗、房、不羹、匱咎如、驪戎、山戎、茅戎、陸渾之戎別紀〉，《孔孟學報》，14，臺北，1967.9，頁 137-166。
- 斯維至，〈北狄與赤狄白狄考辨〉，《大陸雜誌》，94：3，臺北，1997.3，頁 22-27。
- 楊建華，〈《春秋》與《左傳》中所見的狄〉，《史學集刊》，1999：2，長春，1999.5，頁 17-22。
- 楊純淵，〈春秋山西北狄考〉，收入山西省考古學會、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編，《山西省考古學會論文集（一）》，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頁 118-122。
- 趙尺子，〈「漢蒙語文比較學」零簡〉，收入趙尺子，《蒙漢語文比較學舉隅》，臺北：中國邊疆語言研究會，1969，頁 354-358。

- 趙尺子，〈史記匈奴傳譯名新釋〉，收入趙尺子，《蒙漢語文比較學舉隅》，臺北：中國邊疆語文研究會，1969，頁 90-140。
- 趙鐵寒，〈春秋時期的戎狄地理分布及其源流（上）〉，《大陸雜誌》，11：2，臺北，1955.8，頁 6-13。
- 劉文鵬，〈內陸亞洲視野下的「新清史」研究〉，《歷史研究》，2016：4，北京，2016.8，頁 144-159、頁 192。
- 繆哲，〈漢代藝術中外來母題舉例——以畫像石為中心〉，南京：南京師範大學美術學院博士論文，2007。
- 鍾熾，〈簡析明帝國的內亞性：以與清朝的類比為中心〉，《中國史研究動態》，2016：5，北京，2016.10，頁 36-42。
- 韓茂莉，〈論中國北方畜牧業產生與環境的互動關係〉，《地理研究》，22：1，北京，2003.1，頁 89-95。
- 韓茂莉，〈歷史時期中國疆域伸縮的地理基礎〉，《中國文化研究》，2016：2，北京，2016.5，頁 71-79。
- 羅新，〈內亞視角的北朝史〉，收入彭衛主編，《歷史學評論》，第 1 卷，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頁 108-115。
- 羅新，〈內亞傳統的連續性與中國歷史的內亞性〉，收入羅新，《黑氈上的北魏皇帝》，北京：海豚出版社，2015，頁 66-74。
- 吉本道雅，〈史記匈奴列伝疏証——上古から冒頓单于まで——〉，《京都大學文學部研究紀要》，45，京都，2006.3，頁 33-83。
- 佐藤長，〈春秋期の狄について〉，收入佐藤長，《中國古代史論考》，京都：朋友書店，2000，頁 215-253。
- 石本利宏，〈先秦期における中原と北方の関係について——晉における北方民との婚姻を中心として——〉，《研究論集》，9，名古屋，2012.3，頁 7-17。
- 田中柚美子，〈左傳に見える軍行——戎・狄研究の一助として〉，收入三上次男博士頌壽記念論集編委會編，《三上次男博士頌壽記念東洋史・考古學論集》，東京：朋友書店，1979，頁 277-295。
- 田中柚美子，〈晉と戎・狄——献公の婚姻關係を中心として——〉，《國學院雜誌》，76：3，東京，1975.3，頁 23-37。

- 渡邊英幸，〈春秋時代の国際会盟と華夷秩序〉，收入入間田宣夫編，《日本・東アジアの國家地域人間——歴史學と文化人類學の方法から》，仙台：入間田宣夫先生還暦記念論集編集委員会，2002，頁 6-32。
- Brosseder, Ursula B. "A Study on the Complexity and Dynamics of Interaction and Exchange in Late Iron Age Eurasia." In *Complexity of Interaction along the Eurasian Steppe Zone in the first Millennium CE*, edited by Jan Bemmann & Michael Schmauder, pp. 199-332. Bonn: Vor-und Frühgeschichtliche Archäologie, Rheinische Friedrich-Wilhelms-Universität, 2015.
- Hanson, Victor Davis. "From Phalanx to Legion." In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Warfare*, edited by Geoffrey Parker, pp. 30-45.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 Hanson, Victor Davis. "Genesis of the Infantry." In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Warfare*, edited by Geoffrey Parker, pp. 15-29.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 Kierman, Frank A. Jr. "Phases and Modes of Combat in Early China." In *Chinese Ways in Warfare*, edited by Frank A. Kierman, Jr., and John K. Fairbank, pp. 27-66.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4.
- Knauer, Elfriede R. "The Queen Mother of the West: A Study of the Influence of Western Prototypes on the Iconography of the Taoist Deity." In *Contact and Exchange in the Ancient World*, edited by Victor H. Mair, pp. 62-115.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6.
- Redfern, Rebecca C. et al. "Going south of the river: A multidisciplinary analysis of ancestry, mobility and diet in a population from Roman Southwark, London." *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Science*, 74 (October, 2016), pp. 11-22.
- Starostin, Sergei A. & Ilia Peiros. "Altaic loans in Old Chinese." In *Past Human Migrations in East Asia*, edited by Alicia Sanchez-Mazas et al., pp. 254-262.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8.
- Xydopoulos, Ioannis. "Defining identities in the Black Sea region: The case of the Massagetae in Greek literary sources." *ΕΓΝΑΤΙΑ* 14, (2010), pp. 19-28.

#### 四、專業辭典

- Trask, R. L. *The Dictionary of Historical and Comparative Linguistics*, 北京：  
世界圖書出版公司，2011 影印本。
- 哈杜墨德·布斯曼 (Hadumod Bussmann) 著，陳慧瑛等編譯，《語言學詞  
典》，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
- 馬修斯 (P. H. Matthews) 編，《牛津語言學詞典》( *Oxford Concise Dictionary  
of Linguistics* )，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00。
- 陳新雄等編，《語言學辭典》，臺北：三民書局，1989。

## “Retreat by three stages” and Cultural Affinities between Northern China and Inner Asia during the Pre-Qin Era

Chen, Chien-wen\*

### Abstract

The expression “retreat by three stages (30 miles)” (退避三舍) has its origins in th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of Chinese history. When Chong’er (697-628 BCE), the exiled Duke of Jin, was asked by the King of Chu how he intended to repay the king’s personal kindness to him, Chong’er reportedly replied that if he ever met the king in battle, he would withdraw his troops by three stages. This story is indicative of the military culture of ancient China, which emphasized the need to show generosity to the enemy on the battlefield. In addition, it reflects how the aristocratic ruling class during the pre-Qin period was governed by a sense of fair play. Intriguingly, something akin to “retreat by three stages” is also found among the ancient nomadic Massagetae of Central Asia: when they were fighting against Cyrus II of Persia, they made similar demands on him. Based on the evidence provided in this paper, it seems likely that close ethnic and cultural contacts existed between the inhabitants of northern China and those of Inner Asia during the pre-Qin period. It also seems likely that northern China was the source of many practices found in the Inner Asian region.

**Keywords:** Retreat by three stages, Marching speed, Massagetae, Rong-Di, Interlocking belt of agriculture and husbandry, Inner-Asia-ness

---

\*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History,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